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汉学论丛

(第二辑)

朱立元 陈光磊 主编

HAN XUE LUN CONG

辑前致语

1997年5月,在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立10周年的时候,我们开拓了一片学术园地——《汉学论丛》,当时编辑出版了第一辑。现在,经过我院同仁们的辛勤垦殖,又结出了新的果实,这就是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册《汉学论丛》第二辑。

本辑收录论文凡33篇。其中有关汉语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计16篇,有关文化、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方面研究的计17篇。可以说,这比较广泛的论域,也正显示了我院同仁们的学术研究既是以中国的语言文化为重心,而又是多方位、多侧面、多层次的。同时,本辑论文的作者一半以上是青年教师,又大多是博士、硕士,这就更使我们这片园地富有朝气和生机。

著名学者、本院兼职教授章培恒、顾易生、潘富恩诸位先生都惠赐稿件,使我们的论丛大为增色。谨向他们致以热切的谢忱!

本辑论丛由院长朱立元教授和我负责主编。立元先生在国外讲学期间,论丛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是由我操持的,所以,编辑上如有缺失或谬误,责任应当由我承担。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陶黎铭副院长和应建雄、陈潮、陶炼诸位先生的许多帮助,于此致谢。

欢迎方家和读者对我们的论丛提出批评指教。我们将在《汉学论丛》这片学术园地里更加勤奋地耕耘,希望能不断有新的成果奉献给大家。

陈光磊

1998年12月20日

目 录

《鲁迅全集》的一条注	章培恒(1)
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主要特色	潘富恩(8)
试谈中国古代文学中避世倾向的形成	顾易生 金昌斌(21)
中国现代散文的当代复兴	朱立元(37)
“程度副词+有+名”探微	高顺全(51)
论 NP1-NP2-VP 句中 NP2 的语义羡余现象的 语用原因	吴中伟(60)
介词短语“在+处所”前置、中置和后置的条件和 限制	王一平(67)
“比”字句的句法、语义特征 ——兼谈对外汉语教学中“比”字句的 偏误分析	许国萍(77)
也说“年、月、日”	陶 炼(89)
从日语与汉语的基本差异谈对日本学生的汉语 教学	许金生(94)
称谓新现象	金 路(101)
试论汉译外来词与汉语特性的关系	王小曼(110)
汉语中“圆”的文化意蕴	秦 湘(118)
汉字字形规范与对外汉字教学	陈阿宝(122)
对外汉语教学重点论析	贺国伟(130)
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	彭增安(137)
中高级听力教学的学生心理和语料使用方法	王新文(150)

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类集合法·····	沈 岚(155)
关于建立经济汉语教材体系的设想·····	袁建民(161)
从上海都市经济的特质看茶文化的推陈出新·····	要 英(166)
古典诗歌艺术琐谈	
——读柳宗元诗札记·····	王安国(172)
北宋大晟词人群论略·····	施国铎(180)
公安派与五四文学运动·····	赵雪倩(190)
浅谈钟晓阳小说创作特色·····	戴 蓉(195)
试论《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》与《倾城之恋》·····	谈蓓丽(201)
叔本华与佛教·····	陶黎铭(210)
朱子哲学：“道统之学”抑或是“别子为宗”·····	袁 新(222)
试论庄子的人格本体论及其人生价值取向·····	沈 玲(233)
荀子修辞思想述略·····	陈光磊(242)
两次鸦片战争的文化意义·····	陈 潮(253)
春秋楚国祭祀文化浅析·····	邢蒂蒂(264)
张宗昌鲁军兴亡始末·····	沈文忠(274)
近代留学运动的时代因缘与历史作用	
——以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为中心·····	杨增国(286)

《鲁迅全集》的一条注

章培恒

本文的准确标题，应作《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〈鲁迅全集〉注释本的一条注》，但太长了，只得简化；虽然简化后的意思不大明确，又只得在正文中加以说明。

总的说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质量甚高，对读者很有帮助。但为了使它更为完善，对其个别疏误之处加以补正，恐怕还是有益的。本文所要谈的是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《华盖集续编·马上支日记》中的一条注。现据该社1963年版先引正文如下：

什么事都不想做。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，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。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，又看见几条《茶香室丛钞》³式的东西。已经困入字纸篓里的了，又觉得“弃之不甘”，挑一点关于《水浒传》的，移录在这里罢——

宋洪迈《夷坚甲志》⁴十四云：“绍兴二十五年，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，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，行至舒州境，见村民穰穰，十百相聚，因驰担观之。其人曰，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，其夫不胜愤，独携刀往探虎穴，移时不反，今谋往救也。久之，民负死妻归，云，初寻迹至穴，虎牝牡皆不在，有二子戏岩窞下，即杀之，而隐其中以俟。少顷，望牝者衔一人至，倒身入穴，不知人藏其中也。吾急持尾，断其一足。虎弃所衔人，踉跄而窜；徐出视之，果吾妻也，死矣。虎曳足行数十步，坠涧中。吾复入窞伺，牡者俄咆跃而至，亦以尾先入，又如前法杀之。妻冤已报，无憾矣。乃邀邻里往视，与四虎以归，分烹之。”案《水浒传》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，情状极相类，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。《夷坚甲志》成于乾道初（1165），此条题云《舒民杀四虎》。

宋庄季裕《鸡肋编》⁵中云，“浙人以鸭儿为大讳。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，亦无气。后至南方，乃始知鸭若只一雄，则虽合而无卵，须二三始有子，其以为讳者，盖为是耳，不在于无气也。”案《水浒传》叙鄂哥向武大索麦稗，“武大道：‘我屋里又不养鹅鸭，那里有这麦稗？’鄂哥道：‘你说没麦稗，怎地栈得肥胳膊地，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，煮你在锅里也没气？’武大道：‘舍鸟獠獠！倒骂得我好。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，我如何是鸭？’……”鸭必多雄始孕，盖宋时浙中俗说，今已不知。然由此可知《水浒传》确为旧本，其著者则浙人；虽庄季裕，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。《鸡肋编》有绍兴三年（1133）序，去今已将八百年。

元陈泰《所安遗集》《江南曲序》云：“余童卯时，闻長老言宋江事，未究其详。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，过梁山泊，舟遥见一峰，嵯峨雄跨，问之篙师，曰，此安山也，昔宋江事处，绝湖为池，阔九十里，皆藕荷菱芡，相传以为宋妻所植。宋之为入，勇悍狂侠，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。至今山下有分赃台，置石座三十六所，俗所谓‘去时三十六，归时十八双’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。始予过此，荷花弥望，今

无复存者，惟残香相送耳。因记王荆公诗云：‘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想见江南。’味其词，作《江南曲》以叙游历，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。（原注：曲因蠹损无存。）”案宋江有妻在梁山冻中，且植菱荷，仅见于此；而谓江勇悍狂侠，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，知《水浒》故事，宋元来异说多矣。泰字志同，号所安，茶陵人，延祐甲寅（1314），以《天马赋》中省试第十二名，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，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，卒官。至曾孙朴，始集其遗文为一卷。成化丁未，来孙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。《江南曲》即在补遗中，而失其诗。近《涵芬楼秘笈》第十集收金侃手写本，则并序失之矣。“舟遥见一峰”及“昔宋江事处”二句，当有脱误，未见别本，无以正之。

在以上一段文字中，共有四条注。其注4、5、6分别注释“洪迈《夷坚甲志》”、“庄季裕《鸡肋编》”和“《涵芬楼秘笈》”，均不涉及对鲁迅原文理解的原则性问题，所注也简明确切。重要的是注3。鲁迅的原文是“又看见几条《茶香室丛钞》式的东西”，而此注却只注了《茶香室丛钞》，现引其注文如下：

《茶香室丛钞》，清朝俞樾所著笔记，共4集，凡106

卷。俞樾（1821—1906），字荫甫，号曲园，浙江德清人。

孤立地来看，这里对《茶香室丛钞》及其作者所作的注一点都不错。但《茶香室丛钞》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，鲁迅自己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和《小说旧闻钞》就不止一次地引用过。所以，读者在读了此注后一定会认为鲁迅在此处引这“几条”“东西”是觉得其在学术研究上有参考价值，因而特为推荐；虽然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对他何以曾把它们“团入字纸篓里”而感到诧异。其实，鲁迅在这里称之为“《茶香室丛钞》式的东西”，是说这几条中引用古书存在标点错误，并对它们提出批评。而《鲁迅全集》这条孤立来看并不错的注，则对读者起了误导作用。

在鲁迅这段文字中，必须注意的是“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”的“仍旧”和“又看见几条《茶香室丛钞》式的东西”的“又”。这说明鲁迅以前曾“懒懒地翻翻废纸”，并看到过几条与这次看见的相类似

的东西，所以有“仍然”和“又看见”这样的话头。那么，以前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何时呢？上引《马上支日记》的这一段文字标明为“六月二十九日”，而在同书《马上日记》的同年“六月二十五日”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：

虽然连吃药也那么蹭蹬，病却也居然好起来了。……但也不想用功，只是清理抽屉。翻翻废纸，其中有一束纸条，是前几年钞写的；这很使我觉得自己也日懒一日了，现在早不想做这类事。那时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击近时印书，胡乱标点之谬的文章的，废纸中就钞有很奇妙的例子。要塞进字纸篓里时，觉得有几条总还是爱不忍释，现在钞几条在这里，马上印出，以便有目共赏罢。其余的便作为换取火柴之助……

接着，鲁迅引了四条“胡乱标点”的文字，第一、二条均出于“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《茶香室丛钞》”，第三条出于“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《书影》”，第四条见于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《水浒续集两种序》”。顺便在这里说一下，《鲁迅全集》注释本对《马上日记》中这段文字的注释很好，准确地说明了这些被“胡乱标点”的文字应该怎样点才对。

现在我们把《马上日记》的上引文字与《马上支日记》的那一段对照一下看：《马上日记》说“不想用功”、“翻翻废纸”，《马上支日记》说“仍然懒懒地翻翻废纸”；《马上日记》说，在“废纸”中有“胡乱标点”的“很奇妙的例子”，而且被作为“例子”的四条中有两条出于“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《茶香室丛钞》”，《马上支日记》则说在“翻翻废纸”时“又看见几条《茶香室丛钞》式的东西”；《马上日记》说“要（把它们）塞进字纸篓里时，觉得有几条总还是爱不忍释”，《马上支日记》则说“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，又觉得‘弃之不甘’”。前后的联系，极为分明。所以，《马上支日记》的所谓“又看见几条《茶香室丛钞》式的东西”，乃是指又看见了几条“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《茶香室丛钞》”式的东西，也即“胡乱标点”的例子。换言之，《鲁迅全集》注释本在注《马上支日记》的“《茶香室丛钞》式的东西”时，是应把这一点交代清楚的。这样，读者在读《马上支日记》的这一段时，

才会明白鲁迅之引那些文字是为了批评其“胡乱标点”。

当然，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：在《马上支日记》所引的那些文字中，是否存在“胡乱标点”之处呢？现先引一个明显的例子，那就是《江南曲序》的“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，过梁山泊，舟遥见一峰”；这是标点者自己也觉得不通的，所以说“‘舟遥见一峰’……当有脱误”。按，这里其实没有脱误，唯原文标点应作“……过梁山。泊舟，遥见一峰，嵯峨雄跨，问之篙师……”因梁山本在梁山泊中，若乘舟在梁山泊中行，自要经过梁山。所以，点作“过梁山”应是没有问题的。梁山泊在北宋时已有八百里，后虽逐渐缩小，但在明初尚有百里，陈泰的时代梁山泊当在百里以上，则于经过梁山后而泊舟休息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泊舟后，陈泰与篙师闲话而言及宋江事，更没有什么不对头之处。标点者大概因对“梁山泊”这一名称印象极深，看到此段文字时很自然地作了“过梁山泊”，而在发现“舟遥见一峰”不可通时，不去反思自己的标点是否有误，却武断地说“当有脱误”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。

由这一条既知鲁迅所引此段文字中确有“胡乱标点”之处，我在上面所作的推论就有了事实依据，因而对鲁迅何以引另两条的原因也就更为清楚。其第二条当标点作：“浙人以鸭儿为大讳，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。后至南方，乃始知鸭若只一雄，则虽合而无卵，须二三始有子。其以为讳者，盖为是耳，不在于无气也。”其与原来的标点的最大差别，在于原来的标点于“始有子”下用逗号，此用句号。至于原来那种标点法的弊病，只要看一看标点者对《鸡肋编》中此段文字的说明就可以知道。他在读了此段文字后，竟说“鸭必多雄始孕，盖宋时浙中俗说”。但庄季裕明明说是“后至南方，乃始知”“鸭必多雄始孕”，则此自必是南方“俗说”。“南方”的范围远远比“浙中”广大，标点者本不应擅自将其缩小为“浙中”，并由此而推导出《水浒传》“著者则浙人”的结论；其所以有此错误，盖起于在“始有子”下用逗号。因这样一来，“其以为讳者”等语都成了“乃始知”的宾语，而“鸭……须二三始有子”则成了“盖为是耳”的“是”的具体内容。为了强调此类具体内容，汉语在表达上本可将它提前叙述，例如“死亡终究不可避免，人的悲哀就在于此”之类。所以，在

“始有子”下用了逗号以后，标点者就把《鸡肋编》的那段文字理解为“后至南方，乃始知”“其以为讳者，盖为”“鸭……须二三始有子”；而此处的“其”又显然代指“浙人”。说得更明白些，那段文字就成了“后至南方，乃始知浙人以鸭儿为大讳者，盖为鸭必多雄始孕耳”的意思。在这样的表述中，庄季裕到了南方“乃始知鸭必多雄始孕”的事实看不到了；它成了仅仅是庄季裕到了南方后所知道的“浙人以鸭儿为大讳”的原因，于是标点者也就可以说“鸭必多雄始孕”为“浙中俗说”了。然而，庄季裕所要表达的若真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尽可以用“后至南方，乃始知其以为讳者，盖为……”的方式，何必用我们所见的这种易于引起歧义的方式（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必然使人产生他到南方后知道了“鸭必多雄始孕”之事的强烈印象）？况且“鸭必多雄始孕”这一点也不必特别强调而提前叙述。所以，标点者的这种标点法实在是有点问题的。

其第一条的错误，当在于“吾复入宴伺，牡者俄咆跃而至”；“牡者”应属上读。“俄”表时间的短促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“一会儿”；因而有个从什么时候算起的问题。若点作“牡者俄……”，那么，是在“牡者”做了什么事情后的“一会儿”吗？若将“牡者”属上读，那就是杀虎者“入宴伺牡者”后的“一儿会”，意思显豁。当然，若点作“吾复入宴伺牡者”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：杀虎者是否知道还有一匹雄虎？从上文的叙述——“虎牝牡皆不在，有二子戏岩窦下”——来看，他是知道（当由推测而知）的。同时，以“牡者”属上读后，“俄咆跃而至”句就没有了主语；但这种主语省略的句子在文言文中是常见的。

综上所述，鲁迅所引的这三条中确都存在标点的错误，再联系其在《马上日记》中的有关文字，则其在《马上支日记》中引用这三条，原意当在指出其中的标点问题。《鲁迅全集》注释本于《马上支日记》的这三大段，只注“《茶香室丛钞》”，而不注“《茶香室丛钞》式的东西”，恐是不妥当的。此外，鲁迅引用这几条，是否尚有附带指出标点者所作推断的前后矛盾的意思在内，也值得研究。例如，《水浒》写李逵杀四虎事，既可“本此等传说（指《夷坚志》所引传说。——引者）作之”，则写郭哥之以“鸭儿”骂武大老婆“偷汉子”，

又说“煮你在锅里也没气”，又何尝不可是本《鸡肋编》一类记载而作，何能由此而推导出“《水浒传》确为旧本，其著者则浙人”的结论？——倘无此类附带意思，鲁迅似不必引得这么长。

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主要特色

潘富恩

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意义

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“千古明鉴”(王夫之语),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艰难曲折历程。中国哲学史也正是汉司马迁所概括的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而这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丰富历史经验,同时为整个人类的认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。

在世界各国中,惟独中国哲学史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。两千多年前,我国便出现了各具较有系统的不同学派,形成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、百家争鸣的盛况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历代思想家承前启后,在哲学史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中心议题,使哲学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。世界上其他与中国相并列的文明古国,如古希腊、罗马,它们仅在奴隶社会有过哲学思想绚烂的时代。但盛极一时,

后来也就消沉下去了。至于近代一些新兴的西方国家，它们虽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，但他们对自己古国的哲学历史，却因缺乏文字资料而渺茫难考。也只有我中华民族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，有人才辈出的哲人智士，这是世界任何国家所远不能及的，为此我们应感到自豪。

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不但善于融合多种民族的文化思想，而且善于吸收、消融外来的文化。如印度的佛教哲学传入中国后，就成为中国土壤上特有的佛教哲学，尤为明显的是禅宗，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哲学思想（如理学、心学）影响极大，而禅宗又作为中国佛教哲学再传入东亚邻国。因此，外来的文化思想到了中国，凡不改变为中国的模样，也就无法立足，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也是如此。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就是吸收、改造外来文化，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。它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贡献。

学习中国哲学史，我们可以训练思维能力，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的水平，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，他们如何逐渐由浅入深，认识问题何以得，何以失，何以前人曾克服的错误，后人何以又错误重犯，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，又如何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。这些都为我们提供可贵的借鉴而从中受到启发。例如北宋思想家张载，当他承认客观实际为认识对象时，就提出“人本无心，以物为心”的正确命题。他看到理性认识（“德性所知”）比感性认识（“见闻之知”）更高级，两者之间有区别，这是正确的。但他却把两者割裂开来而加以对立，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，从而得出“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”的错误结论，又如程朱理学，他们强调知先行后，以为人的知识是先天具有的，他们立论的前提和最后的结论是不正确的，然而他们对认识过程的分析，却往往有相当的深度，例如朱熹认为认识是一个“自粗而推至精，自近而推至远”的过程，认为认识有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，又认为感性认识“格物”和理性认识“致知”是既有区别又统一的，这在客观上是对张载的“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”说法的修正。明清之际王夫之则提出“行可兼知，知不可兼行”，知行关系又是“并进而有功”，从而将古

代的知行说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并予以发展。

在这里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,任何哲学体系对于以前哲学体系的否定,都是包含了肯定的否定,都是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。新的哲学体系对于旧的哲学体系,一方面要否定它,另一方面要保持其中积极因素,也就是从被否定者身上接受那些可以接受的东西。如张载气的学说被朱熹的理本论所否定,但它(朱子学)作为更高层次的思辨哲学对理、气关系展开多层次、多方面的论证,这又为后来王夫之建立更高形态的气本论哲学所取代,这便是历史上新旧哲学更迭的规律。

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正确命题,其中包含着不少的真理的颗粒,它启迪我们的智慧。荀子的“天行有常”,范缜的“形质神用”,叶适的“言验于事”,王夫之的“天下惟器”,颜元的“理在事中”等,这些哲学命题都有很高的价值。在今天,我们读来仍感到很亲切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我们中国哲学史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,乃是世界其他国家在古代社会阶段所罕见的。春秋末史墨提出“物生有两”,老子的“有无相生”,《易传》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初步地提出事物对立统一观点,北宋张载较详地论述“两”和“一”的关系,朱熹认为事物都是“一分为二……节节如此,逐至无穷”,以事物的对立统一为普遍的道理,然而朱熹错误地认为“理”是绝对的“一”而不可分。王夫之吸取朱熹的“一分为二”观点而加以发展,认为“故合二而一者,既分一为二所固有”。“一分为二”包含“合二而一”,把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后来毛泽东同志引以指事物对立统一规律,赋予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内容,遂成为唯物辩证法的通俗名称。

在认识论方面,中国哲学史上有许多精彩而通俗的论点,例如南宋的叶适用“弓矢从的”即“有的放矢”的比喻,说明人的言论和行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。明代王廷相提出“行一事即知一事,所谓真知矣”,强调“行”对于认识事物,获得“真知”的重要性。清代的颜元提出“手格其物而后知至”,认为人对客观认识过程,也是人亲身经历各种事物的过程。凡此等等,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有关知行问题的论述,虽然看来很朴素,但这些生动的思想资料,是训练和提高

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思想宝库，我们应予以重视。

中国哲学史有不少的哲学家，他们为坚持真理，不怕威胁利诱，表现了坚贞不屈的豪迈气魄。六朝的范缜，为了反对佛教的“神不灭”论，提出“形质神用”的“神灭论”理论，在强大的权势压力下，不肯“卖论取官”，明代的何心隐、李贽，为了揭露和抨击封建道学家的虚伪，遭到迫害而死。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南宋社会，叶适、陈亮积极主张收复北方以求统一，提倡“事功之学”，叶适被夺官，陈亮三次受笞刑。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、黄宗羲，在反抗满清贵族失败后，不屈服清廷的迫害，在险恶的环境中从事著述，写出大量不朽的著作。近代史上也出现不少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，他们作为反帝、反封建的先驱人物，表现了无畏的精神。我们学习古代进步思想家的优良品质，也可以激发坚持正义和真理的勇气和决心，发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我们学习中国哲学史，总结过去，为的是创造未来，为今后更高的精神文明贡献一份财富，也为进一步丰富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努力奋斗，这也就是我们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意义。

中国哲学史的特色

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，但又不脱离世界哲学认识发展过程的共同规律和本质。中国哲学史是由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有历史条件和土壤所决定的，具有自己的历史特色，具有自己所特有生动性、深刻性和丰富的具体形式。中国哲学有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，包括具体的范畴和概念。有如阴阳、五行、天人、名实、知行、义利、和同、一两、形神、有无、本末、体用、动静、理气、心性、能所等等。我们必须对这些在中国哲学长期发展过程，对这些范畴、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具体分析，揭示中国固有特色和规律。上述的这些古色古香的命题、范畴、概念、术语，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中，赋予其不同的新内容。故对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研究，是了解中

国特色的重要步骤。

中国哲学的特色，可概括以下几点：

1. 哲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。

这是中国哲学史优秀传统和显著特点，诚然，古今中外任何哲学归根到底都同自己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。但是西方哲学多采取纯思辨理论思维的形式，它们同自己的现实生活的联系被一些中间环节弄得模糊不清，而中国哲学的所谓“道”、“道术”则相当明显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具有鲜明的“治世”、“济世”，如“治世之道”，“思以其道易天下”，孔子的“礼治”，老子的“无为而治”，墨子的“兼爱”，孟子的“仁政”等。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了句最典型的话：“为天地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研究宇宙的道理是为了解决民众命运的根本问题，清初学者提倡“经世致用”的“实学”。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是围绕看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，使中国近代哲学与中国近代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。

2. 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密切联系。

过去有认为中国古代不重视自然科学，缺乏自然科学上的贡献，实则不然。英国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用大量的史实作了充分的论证，他说：“中国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，特别是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”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凝结着当时科学知识的精粹成果，有的哲学家就是自然科学家，也有的思辨色彩较浓的哲学家，如朱熹对自然科学也有特殊的贡献，诚然有的哲学家以自然科学知识为“小道”而不够重视，甚至或以为“异端”而加以排斥。15世纪以后，与西方新兴国家相比，中国社会就落后了，这是种种历史原因造成的。

3. 宗法伦理道德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直接影响。

中国古代哲学最具特色的是哲学与政治伦理紧密结合，任何学派和哲学家都不离这窠臼，政治伦理观是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哲学家往往不以“智者”面目出现，而是以“圣贤气象”（朱熹《近思录》语）自居，先秦荀子说的“君子之学也，以美其身”求道德行为上的提高，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。故中国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

论等各方面,无不贯穿着这条根本内容——“为人之道”。哲学与道德政治相联系是我们传统哲学的优点,历史上产生过一些有非常强烈的爱国心的思想家,提出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把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看作毕生的使命,他们言行一致坚持真理,产生过大无畏的精神,为救国救民“守死无二”。然而在中国古代宗法伦理道德意志形态占据统治地位,儒家的礼教占据意识形态的“一尊”地位,封建伦理纲常成为专制政治的信条,它也曾是漫长岁月中成为束缚、压迫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。如封建帝王思想、封建特权观念、家长统治、因循守旧等。因此我们传统哲学既有民主性精华,也有封建性的糟粕,故必须剔除封建性的东西,发扬民主性精华。它与政治道德联系紧密有其优点,但也有它的弊端,往往使哲学=政治,简单化,阻碍学术思想的发展,哲学变成教条主义,失去它的生命力。

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

一、天人论

“明天人之际”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探索内容之一。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,历来有“天人合一”或“天人之分”的两种观点。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天与人相互敌对的观点,而讲求天与人的统一,重视人与自然的谐和统一,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生理想的境界,认为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特性“与天地合德”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;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等。老庄主张人类回归自然“无以人灭天”。荀子的“天人之分”,强调“天”与“人”的功用不同,并没有割断天与人的关系。但也应该指出“天人合一”的命题,有时被利用为某些神学的内容,有时将自然规律、现象和人的道德行为混为一谈,尤其是“天人感应”说便是将天人关系神秘化的一个例证。